

讀書雜誌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

第一輯

I

神州國光社

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

王禮錫

一

關於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現在已經逼着任何階級的學者要求答覆。任何階級的學者爲着要確定或辯護他自己的階級的前途，也非解答這問題不可。

普羅利塔利亞學者固然很早就注意這個問題，自第三國際的盲動政策碰頭以來，對於這個問題更迫切的要求解答。現在四分五裂的各派，正各自提出一個見解在各種公開

的或祕密的刊物上刀鎗相見。就像馬玉夫爲脫離幹部派加入反對派時發表的一封給他們全體黨員的信就有這樣的話：“我和史大林派中央及其下級執行者所爭論的主要的是如下幾個問題：‘一，中國現在社會究竟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二，經過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後的中國革命究竟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可見中國共產黨分裂的原因，主要的就在對於這個問題認識的不同。所以馬玉夫在所提出的七個爭論的問題中，首先便要求對於這個疑問的解答。

中國國民黨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過很熱烈的辯爭，在前進與新生命上，很早就發表過陶希聖公孫愈之梅思平諸人的意見。

九月三日至九月七日的中報對於這個問題竟有長篇的時評，或許有人認爲是一個意外的奇蹟。其實這不過表示這問題的嚴重化與普遍化，使布爾喬亞代言的報紙，也感到對於這問題的重要，以爲在這‘根本問題未得解答之先’，其他‘幣制問題，金銀問題，關稅及各種稅收問題’皆如‘不附幹之枝葉，漫無歸宿，而其討論之結果，亦將終歸於蹈空，無補於中國經濟之前途’。並且向中國經濟學社提出了下面的六

個根本問題：

一，世界資本主義之現狀及其前途

二，資本主義之整個性

三，中國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之地位及其關聯

四，中國經濟之變遷與現狀

五，中國經濟之特質

六，中國往何處去

這問題已經成為如何的嚴重與普遍，老邁與遲鈍到申報都已經感到，而且感到得很深刻了！

本來，經濟的結構，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礎的結構，要理解中國一切精神文化的結構，必須澈底的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所以，要理解中國的整個社會，決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礎，然後能把握其整個。

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必須從流動的生成中去理解，而不能專作無機物的靜的分析。從流動中去理解中國經濟的結構，必須從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的演變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闡明其規律性並擷住其特殊性。

為什麼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要找出中國社會的前途’就是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在‘中國社會的前途’

的總問題中，隨便拈出幾個問題來考察。

一，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到來？

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本主義革命？抑是社會主義革命？

三，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否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

.....

要解答第一個問題，就得了解革命的條件是否具備？

要解答第二個問題，就得了解中國現在是封建社會，抑是資本主義社會。

要解答第三個問題，就得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生的作用，與封建勢力是不是存在。

總之，我們要知道應當如何推動社會，就應當把握社會的動向；要把握社會的動向，就應當理解社會的結構，尤其是其基礎的結構。

這樣，就算很簡單的說明了這問題的重要性。

但這問題的重要性，是怎樣的被暴露呢？

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而與資本主義恰恰相反的一個國家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的革命。自一個可怖的事實的礁石，打轉了這不可一世的理

想的潮頭，於是捲起了失望與懷疑的漩渦。‘我們的動向是錯誤了嗎’？這個問題便在一般革命的人們的腦子裏旋轉。‘帝國主義根本不足以阻礙中國的發展，中國根本就沒有封建勢力’。在革命時代噤若寒蟬的學者也就很武斷而有力地發表他的極端的反對的論調。這不能不使一般有思考工具——唯物史觀——的人，沉入於更深刻的思考，從行動動向的懷疑，而考察社會的動向；從社會的動向，而考察社會的本質；從社會的本質，而就流動中考察社會的史的生成。堅認其行動的絕無錯誤者，亦從這步驟與方法去作他們的辯護。

於是，中國社會史的問題，遂逼着各階級各黨派的學者爲着牠以鬥爭的姿態在思想的戰場上出現。

二

自帝國主義的外力在中國社會發生作用以來，中國思想界發生兩個激烈的戰爭——人生觀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一個是過去了，一個正在造着鎗林彈雨的混戰。

這兩個論戰的接踵而來，是表示中國社會的變革之迅疾。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幾個不同之點，認識這兩個論戰在經

濟的變革上是什麼意義。

一，人生觀論戰，一方是科學，對手方是玄學；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這兩個對手方都不存在，因為到現在科學已成為常識的‘真’，玄學已成為常識的‘幻’。

二，在哲學觀點上，人生觀論戰，一方是極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極端的唯物；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的爭鬥，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

三，人生觀論戰是以普遍的真理為研究的對象，各有可根據的現成的理論；中國社會史論戰是以中國的實際的動的社會為研究的對象，沒有可抄襲的藍本。

四，在方法上，人生觀論戰一方面是以形式邏輯做武器，（雖然他們也以形式邏輯為不足，但終跳不出形式邏輯的圈子。）一方面是以玄想做武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五四以後，中國資本主義抬頭，資本主義的武士——科學，自然披掛着全副武裝——形式邏輯——出現於思想的戰場，來掃盪封建的魂魄——玄學鬼。封建的屍體早已僅僅剩下些殘骸，而封建意識便成了無所依歸的野鬼，其脆弱自不禁科學的一擊。所以這

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一方是封建殘餘勢力，一方是新興資本主義勢力。

當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際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恰恰與資本主義國際相對立的國際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中國社會本身的變革亦正在這車輪中旋轉，爲着兩個外力的加入，而這變革也就因而加速。各各爲要辯護自己階級的前途，便對於中國社會加以不同的分析。所以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爲着各階級的畸左畸右，形成許多不同的意見。

因此，這個問題是由世界革命，中國革命而發生，其論定亦將影響於中國革命乃至於世界革命的前途，而其力量則不但調動廣大的各階級的鬥士，並且調動世界的革命理論家參加這個戰鬥。這是何等偉大的一個論戰！

但是，這個論戰是不像人生觀論戰的容易得着結論的。地球不是方而是圓的，不是日出於扶桑沒於若木，而是地球繞日，是已有科學的證明；輕二養一化合成水，這也是可以當面實證，誰都不會加以懷疑的。但是關於中國經濟的統計是缺乏得很。而所有的統計，又得估量他的可靠的成分；研究近代的東西幾乎要像研究古代的東西一樣去做一番辨偽

的考據工夫。即使是可靠，而對於材料所得到的認識又各自不同。像任曙在他所著的中國經濟研究引了歷年輪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數字上告訴我們輪船多於帆船，並且輪船逐漸加多，帆船逐次減少。他的認識是‘帆船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帆船是封建的表徵，輪船是資本主義的表徵’，然後得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的結論。而嚴靈峯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却對於這個統計得出不同的認識。他很俏皮地說：‘牛是商品呢？耕種工具呢？食品呢？看牠所處的條件如何而定。人是叛徒呢？反動派呢？革命家呢？看他所處的生活條件如何而定。才錯，帆船如果在封建制度下專門為領主們運輸自然品的貢稅，奴隸，兵士，牠當然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但是，在今天，中國的帆船的作用已經不是這樣，牠同樣是運輸資本主義制度下唯一生產對象的商品了。難道今天在帆船上所載的商品，便變為封建時代的領主和農民滿足自己的生產物嗎？……在目前中國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把輪船和帆船的載量來比較，並不是把資本主義與封建經濟比較，倒是把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罷了。……其實，應該用作表示資本主義勢力

向上發展的趨勢，和生產集中的趨勢’。這是這論戰不容得着結論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歷史是大不容易明瞭，就歷史的開始已經把握不住端倪，有以為和歐洲的情形一樣，有以為‘與水門爭’應當寫在中國歷史的第一頁。其發展也很特異，長期間的停滯，不能依着歷史的律規發展到工業資本的階段。而這‘長期間’是封建時期？或者是商業資本時期？這‘停滯’，是為什麼原因？中國是不是可以不藉外力走上工業資本的階段，換句話說，中國是不是自己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發展？這些都是現在爭論着而不能解決的問題。馬克思對於這奇異的國度也不能十分理解，所以對於社會的形式，他特別舉出一個‘東方式’的名詞。‘東方式’這個謎的提示，現在正迷亂着多少人們。

此外還有許多麻煩：像歷史的浩繁與蕪雜，現在經濟的多層，不容易找出其領導的生產力等等，都是阻礙着這問題不容易得到結論的原因。

三

像這樣嚴重，繁雜的問題，一面應當從鬥爭中鼓動思想

界的研究熱，一面應作有組織的合作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效率。在這個大問題之下，分爲若干問題，每人或每組對於其中的一個問題或幾個問題負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審查，以及對於這些材料的組織與問題的試解的責任，然後由大家加以細密的討論。這樣才可以免除‘流於空疏’的毛病。這樣思想研究的合作組織，到處可以有，尤其在學校裏面最方便於這樣的組織。

從前梁任公述他自己讀書的經驗，‘爲著作而讀書，則分外感到興趣’。爲究研問題而讀書，其興趣自然又更甚於爲著作而讀書。若爲着要解決個人行動的方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社會的動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世界的動向問題，那會更如何的迫切地緊張地實際地去讀書！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發展的研究是解決個人，全社會，全世界的動向的問題，像日暮途窮迷惘於深山大澤中的時候，對於問路是如何地迫切啊！在整個問題中得到一部分的光明，應當比天文家發現一顆星球還能獲得更高的歡欣。我們可以預料着將有一個更熱烈的研究空氣會爲這個論戰所誘發。

現在爲着研究的便利起見，有系統的爲這個研究的對象提出許多問題，也許可爲研究這問題者的一個幫助吧！

一，歷史上的幾個大關鍵：

1. 原始共產社會在歷史上的根據。

從史的常識來證明，中國歷史的第一頁，應當為原始共產制所佔據，但幾千年前是否曾遺留這樣的事實下來給我們有憑有據的寫在歷史上呢？郭沫若以為有很多史料：

“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傳說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個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者血族羣婚的母系社會”（古代社會史研究第十頁）

‘二嫂使治朕棲’（孟子）‘眩弟並淫’（天問）明明表示‘舜與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與象的公妻”。（同上）

“我們在堯典中看那些‘四岳’‘十二牧’，……不是一些各姓的酋長軍長在開氏族會議，在推選新的酋長或軍長的嗎？”

.....

這些他都拿來作原始共產制度的證明，但對於這些材料的來源，一些也不加以考證。‘這些材料是靠得住的嗎’？解答了這個問題，才能夠引用而無弊。對於無史時代的史的敘述，自然只能根據傳說，而不能根據真的史實，不過就是傳

說亦必需證明其爲傳說，因爲還有‘托古改制’的故意造作史實，這樣的材料是還不及傳說之可靠。像關於舜聚堯二女的事，如果是民間的傳說，自然純粹民間文學的詩經應當有不少的可尋之跡。但是，一點也沒有。堯舜等等故事，若竟是儒家托古改制所造成的，用來作史前的根據，那未免太孟浪了。

他並且以爲“商代的社會必然還是一個原始共產制的民族社會”，而其根據是從甲骨文中看出，其卜辭中用牲之數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農業雖已發明，但所有的耕器還顯然是歷器或者石器，所以農業在當時很幼稚的。

商代的社會是原始共產社會呢？是封建社會的初期呢？這也是需要加以詳細的研究的，因爲這是中國有史之始。

2. 中國的封建制度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開始崩潰？

郭沫若歷舉尚書中對殷民的賤稱，和左氏定四年傳：‘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門氏尾門氏。與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以證明周以殷爲奴，推定周代是奴隸社會。而以秦始皇爲‘在中國社會史上完成了封建的光勳’。直到最近百年內帝國主義

在中國發生作用，封建經濟才分解。

却同時陶希聖以及其他許多人，則承認周代的大封同姓和井田制度是封建的最盛時代，而春秋時封建制度便開始分解。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毅然決然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關鍵；中國社會在這個時候結束了封建制度’。

對於中國同樣史實的考察生出這樣極端不同的見解，我們贊同那個見解，或者都不贊同？

歷史的史實是勝於雄辯的。周代的史實使我們知道，無論從土地制度看，或是從統治的形式看，毫無疑義是封建的黃金時代！秦代焚書坑儒，建立法治的專制統一的帝國，廢封建爲郡縣，集中富豪於都市，這都明白的證明是商業資本的代表者。秦始皇的真父呂不韋就是用經商的方法把天下買來的。漢朝的大封諸侯，重農賤商等等史實，顯明是秦朝商業資本政權的反動，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晉南渡以後，南方經濟漸次開發，到六朝時代，南朝的商業資本已占經濟的領導地位，這勢力漸次的侵入到北方，隋代開發運河，商業資本遂得到統一的統治。在歷史上展開這些史實，似乎是不容易加以否認的。但在這裏主要的是提出問題，所以用不

着多量的引證來證明自己的意見。

3. 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

在共產黨的幹部派的理論是根本否認中國社會史上有商業資本主義的一個時期（前資本主義時期）。史實所詔示於我們的確是這樣呢？或者要辯護他們的行動然後造作這樣的理論呢？

商業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作用也是很可研究的，牠在社會史上是不是可以發生領導作用？牠是否可以使社會變質？牠和土地資本結合是會發生怎樣的作用？牠在中國社會史上若沒有其他阻力是不是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自動的發達到工業資本的階段？這都是需要費力研究的問題。

不過我們研究商業資本的問題，首先要明瞭商業資本的性質，牠的性質不是建立在生產工具的變更，而是在生產關係的變更。這就是說，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的方法依然是和封建時代相差不多，蒸汽還未發明。其與封建經濟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封建生產的目的是在自給，商業資本是為商品而生產’。所以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僅僅是封建與資本主義時代的橋梁。這橋梁時代何以在中國會這樣長？這却另外是一個問題。

4. 什麼原因使中國不能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代？

拉狄克把這個原因歸之於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郭沫若歸之於沒有發現蒸汽機。此外還有各種的歸咎。

我以為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固然是一個原因，但為什麼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呢？這原因是爲中國在地理上是便利於統一，就是割據也是各以希求統一的目的去割據，這就是說，中國地理上不能形成幾個對立的獨立國家，所以競爭着向海外發展不是十分必要的。

又中國經過幾度低級文化民族的侵入，將商業資本主義所建立的文明踏得粉碎，雖然低族文化的民族始終會被高級文化民族所同化，但在經濟上又得走過一度回頭的路。每當恰好有發展到工業資本的希望，又給遊牧民族打回頭了。

因爲以上兩個原因，商業資本的累積便無其他出路，只是與土地資本結合，造成農村經濟的崩潰，造成間歇期的農民暴動。我們相信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是能按照歷史的規律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外力的阻礙，決不會像郭沫若所說中國民族是天然的不能‘發明蒸汽

機’，沒有發明蒸汽機是各種外力阻礙的‘果’而不是‘因’。

關於這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應當加詳慎的研究，上舉的兩個理由不過是隨意拈出，作為關於這問題的研究的一點意見而已。

此外像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幾個農民暴動的問題，陶希聖所提出的士大夫階級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出的亞洲地租形態問題等等，也是應當加以詳細的研究。

這些問題之中，就像陶希聖所提出的士大夫階級問題，因為各人的認識不同，而有種種不同的意見。

陶希聖提出這個問題時，表示對這問題特別的重視，中國社會結構的特色，陶先生完全歸之於這個階級。他說‘秦漢以後，中國已經由封建制度進入於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

對於士大夫階級有許多人提出過相反的見解。我也覺得士大夫不能成為一個有特殊經濟基礎的階級，牠只是做各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已。自然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的。

二，現在中國經濟性質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們的論戰的目的。如果得到了解決，那我們的行動就有了極有力的根據。對於歷史上的研究，亦不過